斯诺如何介绍新四军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世界介绍了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而斯诺笔下的新四军，就鲜为人知了。

采访项英 撰写多篇报道

1938年8月，斯诺会见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稍后，在周恩来的引荐下，见到了新四军政委、副军长项英，斯诺采访了他。

斯诺在《项英的一支铁军》中介绍了项英的革命活动。项英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0月，项英领导机器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到上海、汉口，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1年，项英曾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策应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项英送走中央机关的最后一支队伍后，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局面。

斯诺写道：“只有3000个正规红军留了下来，其他另有7000个赤卫队，2万个党员的非正规军（游击队）。他们所有的武器是1万支来复枪、几十挺机关枪、几门陈旧的迫击炮以及旧式的兵器，其他的只以手榴弹、刺刀、大刀、长枪作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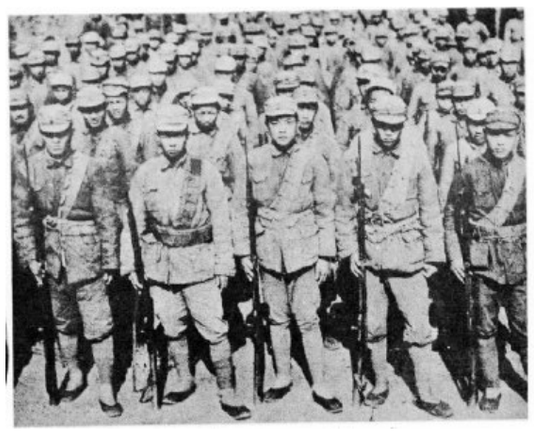
项英多次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中央给予详细指示，明确行动方针。由于党中央忙于红军主力转移，3个月无指示、无回电。

1935年5月，国民党大军约50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项英和游击队员们只能与山中的动物为伴，吃野菜、摘野果、挖竹笋。可是即使如此困难，项英还是抱着必胜的信念。项英领导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原则，在群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进行了长达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9月24日，南方8省游击区最高领导人项英，应国民党江西当局之邀，到达南昌。经过力争，项英给中共中央驻南京的代表发去电报，汇报并请示有关问题。在南方坚持3年游击战的中央分局由此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此时，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国民政府开始同中共中央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协议。周恩来请叶挺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叶挺当年在北伐战争时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称为“铁军”，叶挺想再带出一支新的铁军来，所以，南方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驻南昌。斯诺写道：“1938年3月，新四军组织的消息传播四方，各种不同的共产党部队都从南方来向指定的地方集合，大概都在沪杭宁一带，许多人都来投军，有的带来了步枪，少数的带钱和粮食，旧时的农卫队更带来了手榴弹、长矛和斧头来参加。新四军的人数从5000增加到1万，到7月的时光已达到了2万的数目了。”



新四军之青年队（原载于《良友》）。

工业合作社吸引后方抗日群众

新四军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各支队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在大江南北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一把尖刀。不过，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对中国实行野蛮的经济掠夺，特别是沿海和交通沿线的许多重要城市相继失陷后，中国工业的绝大部分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

加之国民党政府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武器弹药、医疗设施等物资短缺。新四军所使用的武器大部分都是3年游击战争期间带过来的，还有少数是与日军交战中缴获的战利品。

新四军通过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解决当前的困境。斯诺在文章中介绍了工合的情况：“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其目的在恢复生产解决农村失业问题。数千难民已由这工业社给予生产的救济，在新四军区域中已用这种形式开办了许多小型机器厂和其他工业，这个计划，是动员中国的熟练工人去抵抗被日本人利用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工合浙皖办事处，它于1939年4月在皖南山城屯溪成立。新四军进入皖南后，于1939年7月，派叶进明、侯蔚文、蒋传源三人到屯溪参加工合浙皖办事处工作。1939年11月，又在泾县茂林设立了工合泾（县）太（平）事务所。

斯诺写道：“新四军已将沿海口岸来的工人举行登记，而且在去年（1938年）夏天，在上海设立一个秘密的招募工人办事处，在那里，有成千的工人还能记起1926年至1927年上海工人运动时的项英，并且敬仰他的为人，所以有许多人设法投奔他的门下，其中有500个是熟练的技士、机械师和镕铁匠等。”

皖南泾县是宣纸之乡，距新四军军部20华里的小岭，是宣纸生产的主要集中地。新四军到达云岭后不久，民运部就派人到小岭开展工作，帮助纸乡人民恢复生产。泾太事务所在小岭的双岭坑，办起了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当年便生产了10吨宣纸，当年新四军创办的《抗敌报》、《抗敌》杂志、《抗敌画报》《战士报》《共产党人》以及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都用宣纸印刷。

皖南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新四军自给自足的能力增强，一方面把蒋介石从经济上限制、破坏所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也粉碎了日寇的封锁和剥削，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

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斯诺的文章，使得新四军受到广泛关注。而他也与新四军将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此后不久，斯诺又一次为新四军发声。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是为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倒打一耙，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抗命叛变，袭击友军”。国民党新闻机关强迫重庆各报必须在18日刊登国民党政府的“一·一七”通告和国民党“发言人谈话”。

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拒绝刊载，并组织人员撰写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全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满含悲愤地亲笔写下了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四言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月18日清晨，刊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出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一时发行量剧增。为了控制舆论，国民党在重庆设立了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新闻检查，对外国新闻记者的采访对象、采访行动进行严格限制，致使外国记者很难将真相发回各自的国家。

为争取国际支持，周恩来充分发挥他的外交才能，向美、英、苏等国大使和特使说明皖南事变真相，并通过外国记者将皖南事变真相在国外媒体上公布。

1941年1月，斯诺正在香港，他从廖承志处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十分震惊，他气愤至极，奋笔疾书，通过香港向海外发出几则电讯，公开报道皖南事变以及国民党封锁新闻的真相。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星期六晚邮报》等发表了斯诺揭露事变真相的电讯。

斯诺的报道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驻重庆外交官证实事件的真实性后，向伦敦报告了中国“战争中的战争”的事实，而且报告了重庆方面正准备大举进攻延安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在国际舆论面前十分狼狈，被迫承认了事实。国民党政府因此而恼羞成怒，下令取消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采访权。1941年2月，斯诺被迫回到美国。

回美国后，斯诺继续揭露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破坏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径和险恶用心，他撰写了《这是中国的内战吗》的述评文章，发表在美国《亚细亚》杂志1941年4月号上。

斯诺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欧美和苏联的记者纷纷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另一位女记者史沫特莱，因为曾在新四军战地医院担任过救治工作，她在美国各地作了数十场演讲，讲述自己的亲见亲闻，痛斥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与制造摩擦攻打共产党军队的事实。她在《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基本原因》一文中说，“官方报纸发布的第一批消息荒诞而又愚蠢”，“共产党的部队所采取的立场是严肃的”。

这些文章与斯诺的信息相互印证，完全颠覆了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公布出来的歪曲宣传，美英等许多报刊随后纷纷予以转载，最终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据《北京晚报》）

拾遗

鲜为人知的“红色交通线”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为加强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其中经哈尔滨和满洲里通往苏联与共产国际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一条线。这条交通线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中国共产党许多早期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或被派往苏联学习、工作，大多由满洲里出境。数以万计的旅俄华工途经满洲里回国，带回来许多革命书刊，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发展壮大的步伐。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举行。据统计，从满洲里往返的六大代表共有92名同志，包括我们熟悉的周恩来、邓颖超、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等人。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一共存在了18个春秋，直到1937年被破坏。（据《天津日报》）

刘半农的“自我剖析”

1917年，26岁的刘半农开始在北京大学担任法学科预科教授，博得了众多学生的喜爱。3年后，他却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去外国留学。

1925年，刘半农回到国内，随即又回到北京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当时，一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总会吹嘘抬高自己，但刘半农却显示一贯的真诚和谦逊。

有一次，他给学生们谈到自己的求学经过时说：“我出国的时候，是想研究文学与言语学的。不料一到国外，就立时觉得‘二者不可得兼’；于是连忙把文学舍去，专重言语学。但要说到混通的言语学，不久又发现了预备的困难，因为若要在几种重要的活语死语上都用上相当的功夫，至少得十年八年，于是更退一步，从言语学中侧重语音学。这样总以为无须更退了，但不久又发现了我的天才不够，换句话说，就是我的嘴与耳朵，都不十分灵敏，于是只得更退一步，从普通语音学退到实验语音学，要借着科学上的死方法，来研究不易凭空断定的事，正如谚语中所说的‘捉住死老虎牵猢狲’。”刘半农一番坦诚的“自我剖析”，博得了学生热烈的掌声。（据《人民政协报》）

武科举考试 士子之间不比武

武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选拔武备人才的方式，诞生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历经唐宋明清四代，考试内容分内外场，其中外场考器械和气力，内场考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理论。在外场考试方面，唐代武科举考试据《唐六典》记载，主要有：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材貌、言语和翘关举重七项。宋代武科举考试据《宋史全文》记载，主要有：弓步射、马射、弩踏、抡刀枪四项。明代武科举考试据《崇祯长编》记载，主要有：骑射、步射、力和刀四项。清代武科举考试据《钦定武科场条例》记载，主要有：马射、步射和开硬弓、舞大刀、掇巨石五项内容。

除了考察勇力的外场考试外，宋、明、清三代的武科举还有考察文化课的内场考试，通过策论和默写形式完成，考试内容主要以武经七书为主，即《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姜太公六韬》《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唐李卫公问对》。历代武科举考试既考外场也考内场，但没有士子之间的对打或比武考试。（据《天津日报》）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内，有三辆独轮车，大小不一，木架木轴，就连车轱辘也是木头制成，显得粗老笨重，却总是引得游客驻足参观、陷入沉思。

小推车承载的民心

“这是沂蒙老区常见的独轮车，也叫小推车。”纪念馆讲解员说，小推车虽简陋，却能适应崎岖的山地，不仅是农民干活的好帮手，更在孟良崮战役中功不可没。

孟良崮，山东蒙山山系一座险要的山峰，因孟良崮战役而家喻户晓。

为粉碎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5月13日，孟良崮战役打响。

一方是精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整编第74师，自诩为“天下无敌”；一方是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华东野战军，被认为“必败无疑”。

极其残酷的争夺战中，关键阵地数易其手……

5月16日，华野全线出击攻上孟良崮，国民党整编第74师全军覆灭。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人民军队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

一个答案，就在小推车里。

孟良崮战役中，沂蒙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大军，用小推车抢运弹药、运水送粮、运衣送药。男女老少齐上阵，要人出人，要粮出粮，他们用小推车，一程又一程，不断将革命推向胜利。

车轮滚滚，民心如潮。孟良崮战役后，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小推车没有停歇，而是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道路上一往无前。

淮海战役中，543万支前民工，88万余辆大小车，76万余头牲畜，30多万副挑子，构成壮丽的景观。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陈毅元帅感念。

解放战争期间，山东组织了民工1100多万人次、跟随部队转战17个省份，用小推车“把胜利推过了长江”。

小推车虽不起眼，却承载着民心，托起了江山；随着社会发展，小推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小推车精神永不过时。（据新华社）

宋朝小贩叫卖声 连皇帝都爱听

已成为一种艺术 听市井吆喝仿佛置身音乐节 小商贩似全能唱作人

宋朝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小商贩最注重吆喝，不仅都有一副好嗓子，还能即兴填词演唱，卖包子的唱“包子令”，卖饮料的唱“甜水令”……假如穿越到宋朝，处处都是美妙动听的市井吆喝，就仿佛置身于音乐节。叫卖是古人为谋生所衍生的一种手段，发展至宋，已俨然成为了一种艺术，宋人称之“吟叫百端”。但可惜的是，宋朝完整的叫卖内容已经失传。

不同行业的小贩 用不同唱词吆喝

南宋风俗宝典《梦粱录》有云：“街坊以食物、动使、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门歌叫关扑。”在南宋都城临安府，小商贩们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吃的用的穿的戴的玩的看的，其方式都是“歌叫关扑”。

所谓“歌叫”，就是用唱腔来叫卖，吆喝出来如同唱歌。至于“关扑”，则类似于有奖促销。小贩把货物摆在你面前，旁边放一个轮盘，轮盘上画着各种小动物，他把轮盘转起来，让你用飞镖去扎。扎到狮子，几文钱就能买一只大烤鸭；扎到别的动物，只能用正常价钱购买。不同行业的小贩会用不同的唱词来吆喝，同时也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关扑”。

在北宋风俗宝典《东京梦华录》中，小贩吆喝像唱歌，饭店的伙计报菜名也像唱歌：“行菜得之，近局次立，从头唱念，报与局内。”您下馆子吃饭，点了几样菜。小伙计听您点完，转身面向后厨，扯起嗓子就唱，把您刚点的所有菜品一五一十唱出来。后厨里那些掂勺的大师傅听完唱词，立即给您做。

报个菜名而已，为啥非要唱出来呢？从音高上讲，唱比说要响亮，把客人点的菜一一唱出来，客人能听清有无错漏，同时后厨里那些掂勺的和切墩儿的也能马上得知，需要给客人准备哪些东西，而不必让服务员捧着记得密密麻麻的小本子送到后厨。

宋朝酒楼里的伙计和说唱女子，王弘力《古代风俗百图》。

反应快记性好嗓子亮 跑堂的待遇不输厨师

唱肯定比说要难得多，记性必须出奇的好，不然如记不住店里的菜名，也不能立马记住客人都点了哪些菜；嗓子也必须出奇的亮，如果是一副公鸭嗓子或者破锣嗓子，唱出来能把客人吓跑；同时脑子也必须出奇的机敏，不然怎么在刹那之间就能把报给客人的菜以及客人所点的菜组合成舒缓悠扬的曲子呢？

在宋朝的饭庄里，服务员的待遇并不比厨师差。一个合格的厨师，要会煎炒烹炸汆焖溜扒，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一个合格的服务员，同样需要掌握多种绝活儿——嘴要甜，眼要活，手脚要快，记性要好，还要有一副好嗓子，以及在电光石火间就能把菜名组合成唱词的好本事。

不夸张地说，宋朝服务员的这种本事，一点儿也不亚于当时的词人。优秀的服务员瞬间能用合辙押韵方式唱出各种菜肴的组合。

挑选小贩进宫吆喝 皇帝和妃子成顾客

宋人笔记里提到，宋仁宗在位时，有个姓杜的宫廷艺人，专门搜集街巷小贩和饭店伙计的唱腔，据此创作了一套乐曲，名叫《十叫子》。顾名思义，那应该是来源于市井叫卖的十种曲调。

宫廷艺人是给皇帝服务的，为啥要从市井叫卖里寻找灵感和挖掘素材？因为宋朝的皇帝也喜欢听唱腔优美的叫卖声。

南宋文献《武林旧事》记载，每年八月十五晚上，皇帝带着嫔妃们在宫里赏花灯，一边看灯看烟火，一边让临安知府从宫外挑选市井小贩。时辰一到，小贩们提着篮、推着车、挑着担，穿得漂漂亮亮，进入皇宫，在一大片空地上摆起摊来，各自叫卖各自的货品。怎么叫卖？当然还是唱。

皇帝和妃子们成了顾客，循着唱腔去买东西，或买小吃，或买首饰，或买宠物，或买玩具。这些高级顾客不仅给钱，而且打赏，谁的唱腔好，谁的东西地道，谁就有可能挣到大钱。

商业文明遭战争毁坏 完整叫卖内容已失传

可惜的是，北宋败于女真，南宋亡于蒙古，和平稳定且非常繁盛的商业文明遭到了毁坏。那些优雅的唱词，那些动听的曲调，那些兴于市井又兴于宫廷的叫卖声，统统遗失在野蛮残忍的战火中，我们再也听不到了。

宋朝小贩到底是怎么唱的？宋朝服务员到底是怎么把菜名编成歌的？非常遗憾，现存文献里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只能想象。

宋元话本里有一出《快嘴李翠莲记》，新媳妇李翠莲给公婆敬茶，出口成章，应该有市井小贩唱卖货品的样子：“公吃茶，婆吃茶，姆姆（婆家嫂子）来吃茶，姑娘、小叔若要吃，灶上两碗自去拿，两个拿走慢慢走，泡了手时哭喳喳。此茶唤作阿婆茶，名实虽村趣味佳。两个初煨黄栗子，半抄新炒白芝麻，江南橄榄连皮核，塞北胡桃去壳楂……”（据《厦门晚报》）